

书里的墨香阳光般流向心湖。如今坐在空床上，耳边是夜夜不同的鼾声。心中涌不出一个字。

后来，单位腾出一间曾经的车库。在车库两扇大门上贴上两个喜字，一边覆盖着“出入”，一边覆盖着“平安”。人到家了，心也到家了。房子灰暗，有书的光照，我突然有了通透感，久违的文字开始在笔下涌出。

屋檐下燕子飞回南方的季节，我家多了一个女儿。抱着女儿，一边逗着她，一边逗着纸上的文字。那时还没有电脑，很多文字得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。

为了孩子读书，我们三次搬家：2000年，在小学旁边租房；2006年，在初中旁边租房；2009年，在高中旁边租房。小时候，父母在哪里，家在哪里；成家后，孩子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

2019年，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房子，“书房”这个梦想多年的词语，终于出现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。

坐在书房里，书房外是阳台，阳台外是滚滚东流的长江，身后是三壁齐顶的书柜。背靠书山，面向长江，遥想当年那些在厨房饭桌上、卧室木板上写出的文字，那些带着油烟味、葱蒜味的文字，我心中只涌出两句话——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

三十年光阴在黑暗中打磨木器，父亲则用半生辛劳将五个子女送出大山。今日，父亲的工具箱早已找不到了，可能大哥那里还有一两把凿子和锤子。但当我看到黄孝纪《庄稼人》中的《木匠》，仿佛又看见了父亲眯着一只眼，将一根刨好的方料倾斜着打量，一丝瑕疵都不放过；听见了湘南山林间的斧凿声、八公分村木工房里刨花落地的轻响。这些声音交织成网，兜住了即将消散的乡愁，也托举起一个民族最深沉的创造记忆。

从黄庚山到父亲，从“比子”到电动砂光机，变的是工具与时代，不变的是匠人心中那杆秤——一端压着“守”，一端坠着“善”，中间悬着“匠心”。在这个追求速成的时代，或许我们更需要这样的“笨拙”：笨拙地相信手艺的力量，笨拙地守护人性的微光。唯有如此，方能在钢铁森林中，为浮躁的时代保留一份沉静的匠心。

秋雨打在瓦片上，风吹过木窗，带来荒草的唰唰声。

如果可以称为书房，这该是我人生第一间接近书房的地方。床是主角，占据了几乎一半面积，煤油炉、锅碗瓢盆再分天地，留给放书的只有一排小小的竹书架，书架上无书。

我预支了第一个月的工资，赶到城里书店，给自己买了一大堆书，摆上竹书架。让我忘却煤油的浊气，闻到书的墨香。

守着昏黄的油灯，走进书中的世界。心却不在书上，眼呆在窗外，就怕木门敲响。偏偏木门敲响，吓得我惊叫。开门一看，是村支书，他刚从乡里开会回来，特地来看我。

第二天，学生刚走，木门又响。是村里的乡亲，说是村支书安排来陪我壮胆的。从那以后，乡亲们轮流来，抱上铺盖卷，给我讲这山、这水、这屋、这坟的故事。我的每一个夜晚，都在乡亲们轻轻敲门之后充实、温暖。

我突然觉得，在这远离家乡的山村，太阳会在夜里升起。

1992年，我转行到教育局工作。偌大的城市，除了一张办公桌、一张床，没有我的屋檐。人在床上，书在流浪，几年中近乎贪婪地买书、找书、求书，这些书全寄放在朋友家中。

曾经坐在书架边，闭上眼睛，

与釉彩结合烧制茶具，皆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。“匠人不是守墓人，而是持炬者。”父亲与黄庚山用行动证明：真正的传承，从不在故纸堆中沉睡，而是在与时俱进的创造中永生。

善良：木纹里的温情密码。黄庚山除了给家里做家具，还为邻村孩子制作智力玩具。这种藏在技艺中的善意，与父亲“不搞小动作”的信条遥相呼应。父亲做家具时，总会多备一根榫头、一片木板，以备客户日后修补之需。村里有人家突遭火灾，他连夜赶制新床，却分文未取，只说：“房子塌了能再盖，人要是没盼头，才是真塌了天。”

这种善良，在《庄稼人》中化为匠人群体的集体品格。纸匠匠如喜为亡者扎制纸花时，总是力求好看，让亲人更好地寄托哀思；阉猪匠仁曾及时发现一起炭疽疫情，隔断了疫情的传播。匠人们深知：器物承载的不仅是功能，更是人与人之间温度。

木屑纷飞处，匠心永流传。  
黄庚山  
用

赶着羊走上老鹰岩下的山坡，我带的只有一本字典。随便翻一页，随便看一个字，在山坡上开始对这个字云一般地想象——以坡为背景，以树木为背景，以忙碌的蚂蚁为背景，以微笑的羊群为背景。坡上很多坟，向阳的山坡总是祖先们躺着的地方。我不敢以他们为背景，赶快重翻字典，让思绪从那些熟悉的名字上走开。

天当房，地当床。在我的山坡上，我有很多书桌：沙地，大青石，松下，溪水旁。我有很多书：每一棵树，每一只蚂蚁，每一方石头，每一只羊，每一片云，都有它们的书名，都有它们的故事。

我把《新华字典》种在山坡上，种在书房里。这是一个朴素的想法：哪怕日子平淡，不怕，我有一本书种在山坡上，秋天，会收获很多书。

1986年8月，我师范毕业，分配到一所新办的初中任教。学校只在松树木牌上，校园还在图纸上。教室租借在狮子山包上，四间房子，两间做教室，一间做办公室，一间做我的寝室。

晚自习后，其他老师和学生打着火把散去，山包上只留下我一个人。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：“教师是太阳底下最伟大的职业。”我突然发现，我是在一个秋雨绵绵的季节走向这个职业的。

大，因为小的易做。但他坚持选用百年老木，他说：一年起屋百年住。最终，木房子历经风雨仍屹立如初，而那些“偷懒”的同行，木料早已被蛀蚀坍塌。

黄庚山与父亲的“守正”，实则是农耕文明中“匠人合一”的缩影。在《庄稼人》中，木匠的工具从墨斗、曲尺到“比子”，始终与土地紧密相连；而父亲的墨斗、木马、斧凿，亦是丈量人生的标尺。这种对手艺的忠诚，让木器超越了器物本身，成为人格的隐喻。

创新：在传承中开辟新的可能。黄庚山的“比子”堪称民间智慧的结晶。这个由硬杂木制成的阶梯状工具，让他能在黑暗中精准控制木材的尺寸与角度。而父亲的创新，则体现在对传统工艺的改良上。20世纪90年代，他率先将电动砂光机引入作坊，既保留了手工刨制的温润质感，又提升了效率。面对客户定制的新式家具，他用“榫卯+五金”的混合结构，既满足现代审美，又延续了中式木作的灵魂。

这种创新精神，在匠人群体中并非孤例。湘南麓匠用塑料绳替代竹蔑编织箩筐，陶匠将粗陶

天地之间我书房。这不是我的大气，更不是我的格局。说这种话的人，往往没有自己的书房，只有读书的安静与无奈。

当我真正拥有一间书房时，五十年的岁月已翻过去。

乡村岁月，“书房”一词要分开来说。乡村有房，也许有书，但绝没有可称为书房的地方。我家十口人，六间房，父母一间，爷爷奶奶一间，堂屋、灶屋、猪圈屋，留给我们六个弟兄的，只有一间房、两张床、一张四方桌。读书写作业，总有人得去给牛喂水添草，给水缸挑水。没有值日表，四方桌上从来没有红过脸。

我喜欢下雨的日子。木栏里的牛，屋檐下的羊，木窗上的镰刀，都可以不管。捧着一本书，雨在瓦片上滴滴答答，书页上的字也雨点般在心空飞扬——那是童年最幸福的慢时光。

后来有了自己的书房，我特地叫人在阳台伸出一片雨篷，铺上青瓦。雨打青瓦，我在书房里，心便安静下来。

家中除了哥哥们的课本，没有一本课外书。我几乎读完了他们所有的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、政治课本。乡村的雨来得快，走得也快，羊在等我，山坡在等我，割草的镰刀在等我。放羊割草的山坡，该是我最早的书房。

读黄孝纪《庄稼人》中的《木匠》，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。他们都是湘南乡村的木匠，以双手为笔，在木纹间写着匠人的史诗。书中盲人木匠黄庚山的故事尤其令人震撼：双目失明、双耳失聪，却在昏暗的木工房里，用自制的“比子”工具创造出锁住五条门的木柜、精巧的智力玩具，甚至还能打水桶。这不禁想起我的父亲——一位同样以木匠为生的手艺人。他虽目明耳聪，却与黄庚山有着相似的坚守：守正、创新、善良。这些品质不仅支撑起一个家庭的生计，更在时代洪流中锚定了匠人精神的永恒坐标。

守正：以木为尺，丈量人生的重量。黄庚山做木工时，“从不用尺和墨斗墨线”，仅凭手感与经验，便能让木器“四方平整，凹凸契合”。这种对技艺的纯粹追求，与父亲“不偷工减料”的原则如出一辙。父亲学艺时，师傅曾教他“三分木料七分心”——木材的纹理走向、榫卯的咬合角度，皆需心存敬畏。他常说：“偷工减料省下的，是良心；砸掉的，是招牌。”

记得有人家起新房，木料很多，有大有小，他完全可以小充

# 书房记

◎文猛

# 匠心

◎胡玉娟

## 编者按

读书是与灵魂的对话，是与时代的共鸣。本期“书香月”特辑，两篇散文从不同维度诠释了阅读如何照见生命、温暖岁月。

文猛以五十年的光阴丈量书房的变迁：从山坡上的字典到长江边的书斋，从煤油灯到青瓦雨声，阅读始终是照亮平凡岁月的灯火。胡玉娟则读《庄稼人》，在木匠的刨花里读懂匠心的刻度——那是守正创新的坚守，是善良温润的底色。

两篇文章，两种人生，却殊途同归：阅读不在书房的方寸之间，而在心灵的辽阔之地。它让手艺有了温度，让收藏有了故事，让漂泊有了根脉。当文字照进生活，当精神融入日常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最朴素的生命追求——于字里行间安顿身心，在书香氤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。

愿每一位读者都能在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盏灯。

书香月  
特辑

